

1969-1979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合作项目

2002年1月18-19日

中国·北京

朱启祯大使
北京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崇文区台基厂头条 3 号
电话: 65598131

李道豫大使
北京东郊民巷 30 号 601, 100004
电话: 65235821

李凤林大使
北京朝内大街 75 号院 8 号楼 4 门 201 号, 100010
电话: 84016695

王立总领事
前驻芝加哥总领事、中国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
外交部街 33 号, 100005
电话: 65265839

戈德斯坦教授 Steven M. Goldstein
美国麻省史密斯学院
Smith College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01063
电话: 413-585-3537

时殷弘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0872
电话: 86-10-62511350

袁明教授 Yuan Ming
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0871
电话: 86-10-62751633

牛军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电话: 86-10-64216822
Email: njun@public3.bta.net.cn

“1969-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国际研讨会”日程安排

会议时间：2002 年 1 月 17-20 日。

地点：北京国宾酒店（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 9 号，100037；电话：68005588）。

2002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美方参会人员到达、入住。

200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9: 00—5: 45 学术研讨

8: 50: 会议报到。

9: 00—9: 10: 开幕式

姜长斌介绍中方参会人员、柯比介绍美方参会人员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致欢迎辞

主持人：宫力

9: 10—10: 20: 第一节 1969-1972 年的中美关系

主持人：宫力

主题发言（1）：李丹慧（20 分钟，包括翻译）——时晓红

评论员：~~索罗门大使~~（15 分钟，包括翻译）

主题发言（2）：艾奇奈利（20 分钟）

评论员：~~刘建飞~~（15 分钟）
时晓红 时晓红

10: 20—10: 35: 茶歇

10: 35—11: 45: 第一节（续）

主持人：柯比

自由讨论（每人发言不超过 10 分钟，包括翻译）

论文作者答辩（每人不超过 10 分钟，包括翻译）

11: 45—2: 00 午餐、自由活动

2: 00—4: 20 第二节 1972-1979 年的中美关系

主持人: 罗斯

主题发言(1): 玛丽·富特(20分钟)

评论员: 陶文钊(15分钟)

主题发言(2): 宫力(20分钟)

评论员: 芮效俭大使(15分钟)

自由讨论(每人发言不超过10分钟)

论文作者答辩(每人不超过10分钟)

4: 20—4: 35 茶歇

4: 35—5: 45 第三节 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

主持人: 刘建飞

主题发言(1): 科日列夫(20分钟)

评论员: 姜长斌(15分钟)

主题发言(2): 王仲春(20分钟)

评论员: 洛德大使(15分钟)

6: 30—8: 00 欢迎晚宴(国宾酒店黄埔二厅)

参加人数: 48人。

主持人: 姜长斌

致欢迎辞: 郑必坚

美方代表致答辞: 柯比

2002年1月19日, 星期六。 9: 00—4: 30 学术研讨

9: 00—10: 10 第三节 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续)

主持人: 姜长斌

自由讨论(每人发言不超过10分钟)

论文作者答辩(每人不超过10分钟)

10: 10—10: 25 茶歇

10: 25—12: 45 第四节 海峡两岸内部政治与中美关系

主持人: 柯比

主题发言(1): 李捷(20分钟)

评论员: 付立民大使(15分钟)

主题发言(2): 裘兆琳(20分钟)

评论员: 章百家(15分钟)

自由讨论(每人发言不超过10分钟)

论文作者答辩(每人不超过10分钟)

12: 45-1: 30 午餐

1: 30—2: 30 第五节 当前的中美关系

主持人: 罗斯

自由讨论 (每人发言不超过 10 分钟)

2: 30-2: 35 休息

2: 35-3: 35 第五节 当前的中美关系 (续)

主持人: 王缉思

自由讨论 (每人发言不超过 10 分钟)

3: 35-3: 45 中美双方项目主持人小结

宫力 (发言不超过 5 分钟)

柯比 (发言不超过 5 分钟)

3: 45-4: 30 茶歇、自由交谈、会议结束。

2002 年 1 月 20 日, 星期日: 美方人员离会、返回。

目 录

会议日程

会议论文

- 李丹慧：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
——中国外交路线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 艾奇奈利： 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
——1969年-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
- 玛丽·富特： 遗产、借口和疏漏
——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1979）
- 宫 力： 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
——1972-1978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 科日列夫： 苏联对美与对华政策（1969-1979）
- 王仲春： 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
- 李 捷： 从解冻到建交
——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
- 裘兆琳： 台湾对美国之外交政策（1969-1978）

参会人员名单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丹慧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对话 (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¹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 1968 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Nixon)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NLF>)、美国、南越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Paris)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

¹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 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192-220、221-250 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98-116 页;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 Zhai 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²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³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⁴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⁵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或者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⁶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⁷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

² 如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³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⁴ 如周恩来和陈毅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突出批评了河内(Hanoi)的四个行为：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指责说这是四次妥协，尤其第四个让步行动是最实质性的，它使西贡(Saigon)傀儡政权谋求到合法地位，而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中国的立场。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并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处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让步行为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妥协的性质。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Pham Van Dong)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Le Duc Tho)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123-129, 138-14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另，关于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问题，详见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2页。

⁶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⁷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周恩来在1967年4月7-11日与范文同会谈时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⁸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⁹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¹⁰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Washington）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认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则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其对外事务代表，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¹¹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¹²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1月，毛泽东在打破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常规之后，对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松动中美关系的暗示做出了第一步回应：批示“照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并指示“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¹³以此，通过由《人民日报》转载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

2月初，尼克松致函基辛格(Kissinger)，指示要充分鼓励政府“探索恢复与中国人关系的可能性”的态度，而且着手在私下进行；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各组研究对华政策及其目的和利益，包括可供选择的政策取向，以及价值和风险等问题，3月1日前提交报告。¹⁴此

⁸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⁹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中美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 1968. 凡本文直接引用的美国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下同，不另注。

¹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¹¹ 参见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8>)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¹² 1968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Pan Ba (音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7页。

¹³ 1967年3月—1971年3月毛泽东在中办、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文电上的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号21，第65-66页。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同时全文转载了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

¹⁴ The President to Henry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Nation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NSSM)14,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for Centr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5, 1969.

时,中国方面尽管因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叛逃美国一事决定推迟原建议于2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¹⁵毛泽东却并没有为此终止他的战略思考,而是于2月19日指示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¹⁶

对于中美双方政策变动的迹象,越南方面已敏感地觉察到了。3月22日,春水(Xuan Thuy)在同美方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告诫说,美国想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决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中苏争论已持续将近十年,但他们多年来都在援助北越,而且将继续这样做。¹⁷不过到4月以前,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尼克松这时虽然具有了走向中国的意向,但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变。3月初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是月上旬,尼克松向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葬礼的戴高乐(De Gaulle)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¹⁸可事实上,美国这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的恶化程度。3月14日,尼克松于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批准“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Safeguard" ABM program)可使美国在中国的核进攻面前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还进而暗示在遏制、反对中国方面,美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¹⁹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

面对越美两国的这种反应,中国一方面通过新华社电讯谴责美国“同苏修勾结”“在军事上合伙反华”,“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²⁰重新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强调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部署。表示中国“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并在6月14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PRG>)宣告成立时立即致电承认和祝贺;²¹一方面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²²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²³以此将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²⁴

中国方面的上述举措,以及苏联方面对中国威胁的深切担忧、探寻华盛顿对苏中冲突态度的急切之情,及其以进攻迫令中国臣服后恢复苏中结盟打破全球均势的恶劣前景,²⁵使美

¹⁵ 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版,第178-179页。

¹⁶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1页。

¹⁷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ited, 1979, p.173.

¹⁸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版,第628页。

¹⁹ 《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Henry Kissinger 前引书,第170页。

²⁰ 《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

²¹ 参见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Hoang Van Thai)、范雄(Pham Hung)等人会谈记录,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58-160;1969年6月4日周恩来与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的谈话,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4页。

²²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²³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²⁴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Henry Kissinger 前引书,第176页。

²⁵ 关于多勃雷宁(Dobrynin)向美国政府通报珍宝岛事件及美国方面的分析情况,参见Henry Kissinger 前引书,第172-173页;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and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 1994),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著、肖敏等

国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性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当美国要求苏联在解决越战方面给予合作，苏联以自己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为由，给华盛顿碰了个软钉子之后，一直支援越南、对越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国实际成为可供美国争取的结束战争的另一大助力。而且在尼克松看来，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还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²⁶这样，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²⁷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苏联。²⁸

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1962-1986), <Time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95>),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32 页。

²⁷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NSDM)17,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DCI, Chairman of JCS, June 26, 1969; 《大外交》,第 667-670 页;《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 149-164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8-349 页。

³⁰ 毛泽东 9 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 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 这些省区“闻风而动”, 相继成立了援越小组, 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 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集中在农业、畜牧、养殖、种植、水利、土壤化验等几类上; 数量分别为: 广东援助广宁省 20 个, 广西援助谅山省 13 个和高平省 12 个, 云南援助老街 13 个、莱州 15 个、河江 12 个, 湖南援助和平省 16 个。见《出使七国纪实》, 第 127-128 页。

³² 从1965年6月开始至1969年3月为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团83个营,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1969年2月,筑路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9月入越);3月,防空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8月入越。1966年2月至1969年3月,先后派出五批高炮轮战部队共15万余人);11月,国防工程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个支队另1个团);1970年6月,铁道部队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万余人)。经中越双方协商,在越中国支援部队完成既定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出越南回国。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1-97页。

也再次表达了不干预的态度。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谈道：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手了，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³⁴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毛泽东即曾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³⁵由此，尽管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探讨时气氛空前的缓和，但是，当3月柬埔寨朗诺（Lon Nol）—施里马达（Sirik Matak）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the prince Sihanouk）领导的王国政府，成立亲美政权；美国增派泰国正规军入侵老挝，强化侵老战争，并于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Indochina）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NUFK）），支持由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RGNUK））；声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援柬、老、越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³⁶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再次提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表示“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³⁷5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下一次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毛泽东予以批准。³⁸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³⁹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〇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列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而不是扩大其侵略和干涉行为。其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百万大军压境，而且它把如此多的军队集中在另一个国家的边界上，是二战以后所没有过的，由此，客观形势已使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⁴⁰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得中国要加快对

1968年	219899	7087	24792	208.2	18	454
1969年	139900	3906	11917	135.7		162

资料来源：参见李可、郝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页。

³⁴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8-539页。
³⁵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1969年9月1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70-72页。
³⁶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3月24日、5月5日。
³⁷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Le Duan）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63-169。
³⁸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³⁹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⁴⁰ 参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55页。

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如周恩来后来谈到的：中美双方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16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根据中国内战时期的谈判经验，只有直接同蒋介石谈，才能解决问题。⁴¹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同尼克松谈，通过中美高层会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障碍。⁴²由此，中国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考虑，就是想以此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三，明确了上述的立场和态度以后，中国接下来就是静观美国方面的反应，并由美方的态度试探其缓和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对于毛泽东“好战”的声明，虽然基辛格认为它不过是虚张声势，⁴³尼克松却还是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并且在盛怒之下一度下令凡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但他很快即醒悟到，毛泽东还是留有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将其全部堵死对美国毫无益处。⁴⁴这样，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⁴⁵而且，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美国的这种反应，正好符合了中国预想的目标。于是，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⁴⁶

以坚持对越基本方针促中美和解 (1970.7-1971.12)

这一时期，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由于两国隔绝已20余年，中国方面并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而是认为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⁴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以坚持对越外交基本方针，重新大规模援助越南，并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来促进美国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僵硬立场，迈出与中国和解的关键一步。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以1970年7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在押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为起点，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美国并暗示中国美从台湾撤军是与结束越战相关联的，试图引起中国对此问题的关注。⁴⁸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⁴⁹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⁵⁰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出动

⁴¹ 参见1971年11月20日周总理同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53页。

⁴² 参见《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3页。

⁴³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空洞的声明，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承担什么义务，对尼克松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也避免表态。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5页。

⁴⁴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5-696页。

⁴⁵ 参见约翰·H·霍尔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5 to the present, <1995>),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⁴⁶ 中美双方联系情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0页；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6页。

⁴⁷ 参见1971年8月5日周总理同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副社长赖斯顿(Leston)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52页。

⁴⁸ 1970年7-12月中美联系情况，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0-351页；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7-703页。

⁴⁹ 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178.

⁵⁰ 1970年援助枪(支、挺)101800、炮(门、具)2212、枪弹(万发)2901、炮弹(万发)39.7、坦克(辆)无、汽车(辆)无。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数万美军、西贡军队等武装入侵老挝，同时进攻越南南方所属的9号公路地区，对越南北方进行海空袭击，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

其一，12月11日，中国在越南政府发表告全国人民号召书的次日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行动。⁵¹并于次年3月8日在尼克松通过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重申美国渴望与北京改善关系，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⁵²后，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指出美国的行动不但直接威胁了越南的安全，而且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支援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强调说：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公报还提出，越南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并坚信台湾必定会得到解放。⁵³这样，既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又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在3月3日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随后，周恩来访越，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⁵⁴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同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谈到，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并表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还特意要求他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⁵⁵

美国方面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在一个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而且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⁵⁶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向美方发出邀请，重申中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⁵⁷美国官员也建议尼克松抓住乒乓外交的机遇做文章，把欢迎访华归国的美国乒乓球队同欢迎从越南战场撤回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安排到一起，随机提出总统计划中的撤军比例，以显示其寻求亚洲持久和平的良好形象，并消弭国人的反战情绪。⁵⁸这其实也是想将改善对华关系问题与越战问题相联系，通过美国国内的舆论宣传向中国方面示意美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对北京的期望。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问题，确定了有关台湾问题等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关于越南战争问题，报告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报告最后并专门提到中美会谈是否将有碍印支抗美战争和越美和谈，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⁵⁹可见，中国领导人在为会谈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其后不久，

⁵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49页。

⁵² General Haig to Tom Charles Huston Memorandum, February 25, 1971.

⁵³ 《人民日报》，1971年3月11日。

⁵⁴ 1971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在河内市人民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9页。

⁵⁵ Henry Kissinger 前引书，第706页。

⁵⁶ 参见 Henry Kissinger 前引书，第706-707页。

⁵⁷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3页。

⁵⁸ John A. Scali to Dwight Chapin Memorandum, April 12, 1971.

⁵⁹ 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周恩来 7 月 5 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 (Australian Labor Party leader Gough Whitlam) 时, 表示北京现在赞成召开包括非亚洲国家参加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Geneva conference)。⁶⁰这实际表明, 中国方面此时设想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 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此点从几天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突出反映出来。只是中国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过于乐观, 而且低估了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

当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时, 根据美国的议程安排, 他的使命除了向中国人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外, 另一个重要的谈话内容就是越南战争。这样, 在一开始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 基辛格就特意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 告诉中国人, 美国准备从台湾撤军, 但这是与结束印支战争相关联的; 强调说这个战争的结束将加速美中关系的改善, 而战争继续下去将会干扰美中关系。⁶¹试图以此压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谈进程。对此, 毛泽东在 7 月 9 日当晚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 美国应当重新做人。美国要从越南撤军, 台湾不慌, 台湾没打仗, 越南在打仗, 在死人呀! 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⁶²这样, 周恩来在次日的会谈中即明确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的问题。但是, 尽管你们现在占着台湾, 那里却还没有战争。越南则仍在打仗, 在死人, 而且每天都有人受伤。为此, 如果印支局势不能缓和下来, 我们就必须继续援助印支人民, 首先是援助越南人民。⁶³

会谈中, 对基辛格关于美中之间现在已不同与 1954 年相互敌对时期, 而是在良好意愿的基础上、在合作的基点上来解决越南问题的说法, 周恩来没有予以否认, 但随即强调: 美国想要体面地结束战争, 其实这么做的最好的途径就是直接撤军, 把你们所有的兵力统统撤走, 将问题留给印支三国人民自己去解决, 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指出: 越南人民只有两个前景, 第一个是美国撤走它的全部军事力量, 第二个就是继续战斗。接着, 周恩来便就是以美国推翻西贡现政权为实现和平的条件, 还是以越南承认阮文绍政府为美国撤军的条件, 这个使和谈陷入僵局的主要问题之一, 顺势做基辛格的工作, 谈道: 西贡政权如果得不到你们的帮助, 早就垮台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件事上留一个尾巴, 而且不愿意放弃呢? 当基辛格解释说, 如若不谈判, 美国最后也将撤军, 但是时间会拖得长一些, 阮文绍政府将在美国的支援下得到加强, 以此示意西贡在将来越南南北两方一决雌雄的战斗中胜券更大时, 周恩来即表明态度: 你们计划撤军时要越南人同意保留阮文绍政权或是有其参加的联合政府, 同时还要维护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的统治, 越柬人民不会接受, 他们宁愿打下去。⁶⁴而中国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当然, 在试图劝说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政权的同时, 中国方面也表示了在具体问题上不介入越美谈判的态度。例如对于基辛格想讨论的停火时间、撤军和撤出所有军事基地的期限、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也应作为外国军队撤出等问题, 周恩来都以不容商量的口吻答复说: 我们不能考虑这些具体问题, 我们不是越南人。这是你们同越南人磋商的事儿, 而不是

⁶⁰ 一年多以前, 中国方面曾坚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参见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197-198;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第 467 页。

⁶¹ 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p.20, 25. 2001 年 6 月初上海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 联合举行了“中美苏关系演变和冷战的转型”学术研讨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主任 Ostermann 先生与会并特意提供了美国最新解密的 1971 年 7 月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等档案材料复印件, 这对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⁶²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1-42 页。

⁶³ 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13, 25.

⁶⁴ 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p.28, 29, 19, 32, 33.

与我们来谈有关他们利益的事情。我们不干预。⁶⁵由此实际表明了中国不会帮助美国对越南施加压力的立场。另外，为了避免使河内方面认为中美拿越南问题作交易，在讨论准备发表的基辛格访华公报的内容时，中国方面反对写入美方提出的“这次会谈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产生有益的影响”一句话，⁶⁶并最终被美方所接受。

中国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晤谈，一方面亮出了北京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一方面又特意点明中国没有派出一个战士去印支战场打仗；同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提醒说，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表示中国方面不是以此为总统这次来华的条件，但是作为访问的成果，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⁶⁷以这种方式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迈出与中国和解的步伐。

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在10月20-26日的会谈中，讨论了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就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次会晤，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⁶⁸

中美两次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会谈时，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⁶⁹中国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已同美国谈了15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推动撤军的实现，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7月13日，周恩来赴河内通报中美会谈情况时说：越南应利用每一个机会先解决美国撤军问题，而推翻西贡傀儡政权则需要时间。⁷⁰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⁷¹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⁷²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其四，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得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中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不使河内更加亲近苏联。⁷³的确，越南方面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始终是中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情况。只是，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的反应十分强烈。据黎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即表示：越南是我们

⁶⁵ 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3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22-23,25.

⁶⁶ 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1, 1971, 12: 00 midnight-1: 40 a.m.; 9: 50 a.m.—10: 35 a.m., p.2.

⁶⁷ 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2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5.

⁶⁸ 参见 Henry Kissinger 前引书，第 783 页。

⁶⁹ 1971 年 8 月外交部在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中阐明中国的对美方针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469 页。

⁷⁰ 来自越方的消息。见 S.T. Ball,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47-1991, Lecturer in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 N.Y., London 1998. p. 140.

⁷¹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1, 1971, 12: 00 midnight-1: 40 a.m.; 9: 50 a.m.—10: 35 a.m., p.17.

⁷²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26, 29.

⁷³ 参见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New Press, New York, 1998, p.41.

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⁷⁴随后，北京注意到河内《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⁷⁵而且对中美同时发表的关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保持沉默，直到1971年末才向国人宣布，⁷⁶显示了极为抵触的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因此，当11月22日范文同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要求中国拒绝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回绝了。⁷⁷

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接近的趋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妥善解决转变对美政策中的务实与革命的矛盾问题，更加迫切起来。由此，中国一方面通过周恩来反复对国外新闻界发表的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声明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⁷⁸还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⁷⁹在11月25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中重申：支援越南和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是中国人民不可推诿的国际主义责任。只要美国侵略者一天不停止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干涉，只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神圣的民族权利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并且重新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撤走其一切军事力量；必须放弃对阮文绍集团的一切支持和保证。⁸⁰特别是当12月美国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对北纬20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强硬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后，中国方面以外交部12月29日发表的声明作为回复，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外交部18日和26日两次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并再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和印支各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⁸¹一方面以大规模援越为补偿，通过具体行动表明中国决不会以原则作交易的立场。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⁸²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此时对援越问题的重视。

劝越美结束战争以促联美抗苏大战略实施 (1972.1-1973.5)

⁷⁴ Comrade B: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转引自 Stein Tønnesson 前引文。另据中方材料，越南领导人听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将于明年初访问中国，感到十分惊奇，但并未表示反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4页。

⁷⁵ 对于《人民报》影射中美会谈的社论，周恩来7月20日批示张春桥和姚文元说：“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⁷⁶ 参见 Qiang Zhai 前引书，第197页。

⁷⁷ 参见 Hersh 1979年8月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 Nguyen Co Thach（其人1971年11月曾随范文同访问北京）的记录，转引自 Qiang Zhai 前引书，第198页。

⁷⁸ 参见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48、52-54页。

⁷⁹ 11月20-27日范文同率团访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范文同的大幅照片，并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访，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参见当时《人民日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7页。

⁸⁰ 《人民日报》，1971年11月27日。

⁸¹ 《人民日报》，1971年12月30日。

⁸²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1971年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为：枪（支、挺）143100、炮（门、具）7898、枪弹（万发）5719、炮弹（万发）189.9、坦克（辆）80、舰船（艘）24、飞机（架）4、汽车（辆）4011。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